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七五”重点研究课题

民国社会经济史

主编 陆仰渊 方庆秋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责任编辑：马晓玲

封面设计：白长江

民国社会经济史

陆仰渊 方庆秋 主编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华星计算机公司激光照排

冶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28.8125印张 731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500

ISBN7-5017-1439-8/F·905

定价：16.50元

序

茅家琦

近几年来，出版了好几种有关民国经济史的著作。这些著作各有特点，读后均有收获。由陆仰渊等同志主编的这部长60余万字的《民国社会经济史》，也是一部成功之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我个人认为《民国社会经济史》从总体上说，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它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研究对象问题上，本书有它自己的特色。

长期以来，在经济史研究对象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应以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为研究对象；有人认为应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本书作者们则采取了另一种意见，即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还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看法，本书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国近代生产力的发展与变化，又注意到这一时期生产关系的变化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或变化的影响和作用。这样，全书形成了明显的特点，即以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程为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线索。本书以大量的史料说明：在中国，近代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辛亥革命前夕的2%左右，到1949年前增加到20%左右。在38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近代中国社会不是全面沉沦，而是有所前

进，这正是一代先人英勇奋斗的结果。

第二，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的分期问题上，本书作者们没有沿用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发展、加深、崩溃这种纯生产关系的角度考虑的方法。

作者们认为，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角度综合考察，“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逐步纳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封建经济和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逐步消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并得到了发展。只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尚未能代替封建经济和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作者认为这是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根据这个看法，本书把民国社会经济史分为四个时期：（一）中华民国的建立和近代经济的初步发展（1912—1927年）；（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十年经济（1927—1937年）；（三）抗战烽火中的国民经济（1937—1945年）；（四）南京政府的经济总崩溃（1945—1949年）。按照这四个时期，本书分为四编进行论述。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分期，脉络是很分明的。

第三，本书内容力求全面，论点力求平允。

本书作者们没有把民国社会经济史写成民国时期近代工业发展史或者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史，而是比较系统地、全面阐述了各个时期财政、金融、税务、工矿、农业、交通运输、商业、邮电通讯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和水平。这样，从横的方面，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从纵的方面可以看到各个社会经

济部门的发展过程。

本书不仅涉及到直接经济领域内的问题，还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一代名人的经济思想和社会经济团体为寻求中国经济近代化所进行的各种探索活动，以及各个时期执政当局有关的经济决策和纲领计划。例如本书分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经济决策，论述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和他制订的《实业计划》。本书还分析了农村社会改良运动，包括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的经济活动和主张。这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也能够帮助读者多角度地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变化。

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本书力求从实际出发，论点平允可取。例如，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近代工业状况，作者们进行了客观分析，认为：北洋政府时期的工矿业，可以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912—1920年，后一阶段是1921—1927年，前九年是“稳定发展阶段”；后七年是“缓慢发展阶段”。关于北洋时期的农业经济、本书既从整体上认定“农村经济衰败”，“农民生活贫困”，但也分析了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叙述了近代农垦业、盐垦业的兴起，富农经济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四，本书区别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两个概念。

经济史学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作了较详细的研究，成就很大。本书作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新努力。突出的一点是认为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对它们的含义作了明确的界定。

作者们根据毛泽东著作的基本精神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以下三个特性：（一）这种资本来自政府，并由政府官员掌握着经营权；（二）这种资本主义对国民经济的某一方面具有垄断性；（三）这种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官僚资本主义具有另外三个特性：（一）这种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某一官僚的私人投资；（二）这种资本主义的经营权也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三）掌握这种资本主义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操纵某一经济部门，进行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损公利私的活动，以饱私囊。这个区分，我个人认为是实事求是的，有说服力的。

还需提一下的是，本书引用了一批尚未发表过的材料，特别是大量引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历届政府农工商部、经济部、财政部、海关、银行、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的档案材料，这是本书的又一个很鲜明的特色。

由于本书是一部集体著作，主编虽然作了努力，但各章在取材方面与文字风格等方面存在有不一致的地方。对这个问题，读者当能谅解。

绪 论

鸦片战争的硝烟，把东方古老的中国卷进了世界潮流。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在 1911 年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在大陆上的统治是十分短暂的，但却是一个由旧到新，逐步转变的时代，尤其在经济方面，正处于向近代化急剧转变的关键阶段。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集中的表现，因而民国社会经济史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反映中华民国时期经济基础的历史，又是反映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也是在旧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总结、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及其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不仅能在昨天的历史中得到启发，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关于民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象

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围很广，以生产力来说，包括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业，以及与其相应的商业、金融业等；以生产关系来说，包括经济决策机构、经济管理机构和国家的经济制度、政策、法令、各种社会经济团体和各种经济思想等。这些都应当是研究民国经济史的对象。但是在具体研究中，哪些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哪些是研究的次要对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这很需要加以明确认识。在过去经济史的研究中也出现过因对象不明确而发生了某些偏差。早在五十年代曾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不包括生产力”，或者说经济史是“研究生产关系递变的科学”，而“生产力只是一种

条件”。这种观点主要是受当时某些苏联学者的影响。显然是片面的。马克思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①可见不讲生产力，经济史就会变成抽象的历史，变成社会发展史，无法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本质。许多经济史学家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即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力的进步与落后，生产力发展的快慢，是衡量社会经济水平的一个尺度，什么样的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研究经济史必须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结合起来。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受这样那样的因素影响，仍然会产生某些偏向，主要表现在没有把握住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这一问题。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曾出现过强调历史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已经发生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范畴，把生产力的发展或滞缓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生产关系所决定，忽视了民国时期的近代化生产力，由辛亥革命时占国民经济总值的2%，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上升到20%这一事实，显然是违背了历史的事实。

当然，我们在注意研究民国社会经济史必须重视对生产力研究的同时，也不可不注意另一种倾向，过分强调或单纯研究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作用。当前西方国家有一些经济史学家甚至专以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如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亨利认为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其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他注意了资源和劳动力的利用，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用计量方法研究各时期的生产效率，是可取的。但是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存作为前提，忽视生产关系的变化，想掩盖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因而同样得不到正确的结论。正确方法是应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当看到不同的生产关系，有的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的会延缓甚至阻滞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研究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这一研究方法，在研究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尤为重要。

首先，民国时期的经济现象十分复杂，它处于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过渡的时刻，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不到顺利发展的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互相斗争，互相影响。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消长变化中，尽管其总趋势是沿着客观经济规律前进的，但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必须加以兼顾重视。

其次，近代经济的发展，无不与资本的积累相关。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并不是“土生土长”，中国的民族工业不是直接由传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来，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它的资本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商业资本的转化，官僚的投资和买办积累的资本转化，因而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不与官僚、商人和买办产生复杂的关系。

第三，中国的民族资本中，国家资本始终占有重要地位，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属于国家经济命脉部分，大多操纵于政府之手；而国家的大权又为少数几个人掌握，近代经济的发展往往是和政府的决策及某些人的意志密切相关的。

第四，外国资本在华势力相当大，海关等重要经济部门曾操之于外国人之手，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五，整个民国时期内乱外患，重迭不息，国家经常处于军阀争战、外侮纷乘或是革命战火之中，战争多于和平时刻，经济发展往往被纳入战争轨道。

综上所述，可见民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有其复杂的一

面。总的说来，研究的对象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研究其生产数字的消长变化，更重要是要在宏观上研究其生产力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是什么？把握其总趋势和总方向后，才能得出其进步与落后的主要线索所在；再从微观上研究影响这一时期经济进步的各种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也就是把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产生的影响作用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才使我们对民国经济史的真面目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二、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

在前几年，不少中国近代史书刊都把民国时期的这段历史看作是向下沉沦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概念属性的认识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其实，半殖民地并不是指一种社会的形态而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① 他在这里明确地说，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是指国家的地位而言，即中国由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变为失去了一部分主权，处于半独立状态，其一半是独立，一半是殖民地。而半封建，恰恰是指社会形态而言。他同时阐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东来“促使中国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半封建实际上是指中国一方面原来的封建经济在解体，一方面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产生和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半殖民地半封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0页。

建理解成不可分割，即等于“半殖民地加半封建”，应当看到半殖民地化，对中国来说丧失了国家完全独立的地位，是历史的沉沦的一个方面。但也应当看到，“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的转变，包括经济上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新的社会家庭关系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建立等几方面。”^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民主政治和科学文化，对中国旧有的传统封建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使中国人民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和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革命。同样具有进步的一面。如果说中国原有的统一的封建体系发生解体，发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的进步，不是历史的沉沦，更应当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是有时在沉沦，有时在发展；有的方面在沉沦，有的方面在发展。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要使中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不断地觉醒和不断地斗争，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就是中国人民为争取自身独立和富强而英勇奋斗的结果。代表新兴力量的民族资本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由辛亥革命时期的2%，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增长到20%左右；而代表时代没落的封建经济，由辛亥革命时期占90%以上，到1937年则退让到70%左右。外国资本在华经济势力，由1911年时占80%，到1949年时减少到不足20%，总的来说，随着世界殖民地体系的崩溃而趋于退让。

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逐步纳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封建经济和在华外国资本经济势力在逐步消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并得到了发展。只是民族资本经济尚未能替代封建经济和在华外国资本经济势力。这就是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和民国经济史的主要线索。

^① 吴承明在1987年武汉“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8辑，第33页。

三、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成份的构成和关系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构成极为复杂，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在单一的封建经济中增加了外国资本经济，后来又产生了民族资本经济。民国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实际上包括了国家资本经济和私人资本经济两大部分，以后又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除此，还有大量的小生产者。这些小生产者并不构成另一种独立的经济成分。民国时期的主要经济成分包括了国家资本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在华外国资本经济、封建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等。

在华外国资本经济，是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然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应当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本形态”。^①外国资本经济最初在中国领土上的建立，是随着殖民地制度的推移而来的，早期的外国资本是带有殖民地制度性质的。民国时期的外国资本企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军事侵略而强设或强占中国的企业而开设的，完全具有殖民地侵略性质；另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企业，因为它们的资本是在中国的国土上聚敛起来的，又投资在中国经营，它的根是寄生在中国的土壤，其性质就有所区别。这些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的关系，是在同一市场上互相依存和互相竞争的关系。只是外国资本经济利用不平等条约，享有许多特权，使中国资本经济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外国资本的存在，是中国民族资本赖以发展或受到阻滞的一个外部条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内部因素。

^① 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国家资本经济，从理论上说，是指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国家通过资本手段干预国民生产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通过信贷、补贴或减税、加工订货、收购产品等手段来调节经济；另一种是由国家直接投资或与私人合资的企业。它们共同的特性是国家通过资本手段或运用资本形式，从事经营活动。民国时期的国家资本经济常被称为“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一词最早见于瞿秋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 展》^①一文，所指的是中国早期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认为“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② 1947年毛泽东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人认为：“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应当把它们称之为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恰当”。^③ 这是一个正在讨论中的问题。民国时期的国家资本经济，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前者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经济，它继承了清末的“洋务运动”发展而来，仅达到雏形阶段。其特点是初步奠定了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势力，还没有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生产领域，因而北洋时期的民族工业发展具有更多的自由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政治集权的加强，蒋介石十分重视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和干预，于是国家资本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由金融垄断发展到对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展到了最高峰。这种由国家来统制经济命脉的国家垄断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刚刚生长起来的私人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但这种经济仍属于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一个方面，对

① 屈维它：《中国资产阶级的发 展》，《前锋》1923年第1期。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947页。

③ 丁日初：《论抗战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起过重要的作用。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在他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一书中认为，“蒋介石政权是一种畸形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国民政府实行企业国有化，也采取过一些高压手段，迫使企业就范。扼杀了他们曾经有过的那种独创性和主动性。但就实际效果而论，蒋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起过抑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① 他的这些论点可以引为我们参考。

私人资本经济，是中国人民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和刺激下，中国人民要求发展自己的近代资本主义，而且是在和外国资本经济、国家资本经济和封建经济激烈的斗争中得到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是民国时期新生产力的代表。但是私人资本经济从他诞生起就有许多的弱点：资金少、规模狭小、技术落后、在与外国资本经济和国家资本经济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发展缓慢，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尚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封建经济是作为时代没落的一种经济成分。但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清朝时期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一些大中城市中的封建经济势力已大为削弱，逐渐为资本主义经济所取代，在农村还占有相当地盘。但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农村中的封建经济也在开始解体，一方面是地主经济的没落，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在削弱，土地买卖现象增多，自耕农增加，富农经济有了发展；另一方面，是少数资本持有者在沿海等地的荒地上开办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垦公司，在农村中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成分。它包括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政府经营

^① 转引自张富强：《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尝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8辑，第206页。

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等。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但它是一种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

在这5种经济成分中，国家资本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新生力量。在华外国资本经济是影响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经济虽是一个没落的成分，但仍大量存在，是主要经济成分之一。乍看起来他们之间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其实却存在着许多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和斗争的复杂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关系，贯穿在整个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变化，无不与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关。

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有许多弱点。主要表现在它有许多依赖性。鸦片战争前，中国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却没有发展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经济入侵的刺激和影响下，首先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后来一些中国的官僚、买办和商人，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开办了近代化的工业企业，发展成中国自己的民族资本经济。因而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从它诞生起，就对外国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的依赖性。其具体表现在：

- 1、它们需要依靠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设备。

- 2、有不少中国民族资本家，曾经是为外国资本经济服务的买办，他们把在当买办时积累的资金，用于兴办自己的企业，成为民族资本家，因而他们和外国资本经济间保存有资金上的依赖关系。

- 3、中国的一部分民族资本企业，还经营部分从外国舶来的原料和产品，如棉纺厂进口外国的棉花，面粉厂进口外国的小麦；又把自己的部分产品销售给外商，如缫丝厂生产的生丝等。尤其在商业方面，中国许多的商店是销售外国资本企业生产的商品，并依赖其供应商品而攫取利润。

当中国民族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有摆脱对外国资本经

济依赖的要求，尤其当外国资本经济对中国民族经济加紧压迫和加深控制的时候，矛盾更加激化而突出，甚至发生激烈斗争。斗争的方式往往是随着外国资本经济采取的不同手段而不同：当外国资本经济加强商品输出时，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为市场的竞争；当外国资本进行资本输出，在中国境内直接设厂生产，矛盾扩大到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等方面的竞争和斗争；当外国资本主义直接采取军事侵略的时候，民族资本经济也会参与直接对抗性的斗争。但是在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中，各阶层的态度是由他们所处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所决定的。

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和封建经济之间同样存在着既有依赖又有矛盾的一面。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中有一部分出身于封建官僚，他们曾借助于某些官僚或军阀势力，得以调配资金、取得原材料，或得其政治庇护而起家发展，这就是他们对封建主义的依赖性。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如落后的生产力使他们得不到原材料来源或找不到销售市场；地方势力的割据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加上军阀间互争地盘，战争不断，交通阻梗，生灵涂炭，严重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私人资本经济受害更深，迫切需要摆脱封建主义加给他们的祸害。

通过对民国时期 5 种经济成分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民国时期的 5 种经济成分，实际上分为两大阵营，即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阵营内，包括在华外国资本经济，国家资本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和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内。由于中国的私人民族资本资金短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种种原因，面对资金雄厚、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外国资本和国家资本经济，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经常吃亏，备受打击。这种打击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资本经济难以承受，因而严重阻滞了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整个民国时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只局限于沿海的一些大城市，广大的农村和西部地区或边疆地区尚难深入，使中国广大

的腹地封建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因而决定了中国仍保持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态。

四、工商不协调对中国 经济发展的影响

整个近代中国资本经济中，商业资本始终大于工业资本。民国时期尤为明显。据一些不完全的统计资料表明，1919年江苏总人口中有6.9%的人从事工业，有9%的人从事商业。1933年山西全省人口中有5.7%的人从事工矿业，有7%的人从事商业。1924年东北三省人口中有15%的人从事工矿业，有12%的人从事商业。^①1933年全国国民所得总数中，近代工业占2.5%，手工业占6.6%，合占9.1%，而商业却占12.6%^②。如以各大城市工商业资本总额所占的比例为例，商业资本的所占比重均超过了工业资本，1929年汉口的商业资本占资本总额的72.6%，工业资本仅占27.4%；1933年南京商业资本占62.4%，工业资本仅占37.6%；上海商业资本占66.8%，工业资本占33.2%；1935年北京的商业资本占93.38%，工业资本只占6.62%；1936年河南省的八个城市商业资本占94.4%，1944年重庆的商业资本占73%，工业资本都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1936年全国民族资本中，工业净产值为11.7亿元，同年的商业营业额高达30亿元，高出工业产值近3倍，而越到后来，商业资本所占的比重越大，抗战前中国的商业资本约占工商业全部资本的70%，到1948年，商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已达90%，工业资本仅占10%左右。^③

商业资本为什么大于工业资本？这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

① 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3—4页，1928年北平版。

②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第120页。

③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83—85页。